

# 类型差异视域下汉维生命度约束语序的运行规则探析

万鑫, 阿孜古丽·夏力甫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5日

## 摘要

生命度对语序的制约在不同类型语言中呈现系统性差异。本文对比考察汉语与维吾尔语中生命度对语序的制约机制, 发现两种语言虽共享“高生命度成分优先作施事主语、低生命度成分优先作受事宾语”的类型共性, 但因语言类型根本对立, 制约影响截然不同。本文进一步揭示生命度与形态语序的互补规律: 形态标记越丰富, 语序越灵活, 生命度句法强制力越弱; 形态标记越贫乏, 语序越固定, 生命度对语序的句法约束越强。研究为语言类型学提供跨语言实证, 并为汉维对比与双语教学提供参考。

## 关键词

汉语, 维吾尔语, 语序, 生命度

# Operational Rules of Animacy Constraints on Word Order in Chinese and Uyghur: A Typological-Difference Perspective

Xin Wan, Aziguli-Xalif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ugust 13,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5, 2026

## Abstract

Constraints of animacy on word order display systematic divergences across typologically distinct languages.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strictive mechanisms of animacy over word order in Chinese and Uyghur. It finds that although the two languages share the typological universal that highly animate constituents tend to function as agent subjects while lowly

animate constituents typically serve as patient objects, their restrictive effects differ drastically due to fundamental typological disparities. This study further reveals the complementary regularities between animacy and morphological word order: languages with abundant morphological markers feature flexible word order and weaker syntactic coercion exerted by animacy; by contrast, languages with scarce morphological markers possess rigid word order and stronger syntactic constraints of animacy on word order. This research provides cross-linguistic empirical evidenc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offers references for Chinese-Uyghur contrastive studies and bilingual teaching.

## Keywords

Chinese, Uyghur, Word Order, Animac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Comrie (1989:231-249)所著的《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是生命范畴研究领域专业性与阐释深度兼备的经典文献。该书围绕生命度展开完整体系化研究，厘清了生命度同语言的内在逻辑，建立起生命度等级序列，总结了诸多受生命度规则支配的语言表现[1]。

Croft (1990:111-139)在《语言类型学与普遍语法特征》的“语法等级”章节中，梳理了多种通用的语法等级体系，生命度等级便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他细化完善了生命度等级序列，同时提出多项具备参考价值的研究结论[2]。

王珏学者的著作《生命范畴初论》(2004)标志着我国生命范畴研究的开端。然而，该书主要聚焦于词汇层面的生命度探讨，对于生命范畴在句法层面的表现则缺乏深入的剖析。

与此同时，汉语语序研究历来受到广泛重视，而维吾尔语，作为一种黏着性显著的语言，其语序的灵活性往往使人误以为语序研究在维吾尔语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因此，相较于汉语，维吾尔语在语序方面的研究成果显得较为匮乏。

尽管如此，仍有部分学者致力于汉维语语序的对比研究，如扎宜提·热依木的《汉译维中增减词语和调整语序问题浅谈》(1995年)[3]、郑婕的《维吾尔语句法嬗变中的词序作用》[4]、张世才的《维吾尔语语序刍议》[5]等。

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维吾尔语语序的认识，也为汉维语语序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 2. 理论基础

### 2.1. 生命度等级的界定与层级

生命度是生命范畴在语言中的主要表现，它将生命范畴量化为可见的等级序列，使生命范畴的研究更具体，更深入。作为对生命度的最初描写，Comrie (1989:231)给出了一个由高到低的生命度等级序列：人 > 动物 > 无生命物[1]，后来 Croft (1990:112)又给出了一个更详细的生命度等级序列：第一/二人称代词 > 第三人称代词 > 专有名词 > 指人名词 > 非指人有生名词 > 无生名词[2]。

关于汉语生命度等级序列，国内一些学者已经有意识地作出了划分。如杜道流(1998)综合了 Comrie、张国宪和张伯江三家观点，得出汉语生命度有如下等级：第一/第二人称代词 > 第三人称代词 > 指人专

有名词 > 指物专有名词 > 指人具体名词 > 指物具体名词 > 无生具体名词 > 抽象名词[6]。王珏(2004:66)得出一个比较详细的生命度序列: 第一人称 > 第二人称 > 第三人称 > 专有名词 > 称谓名词 > 人 > 动物 > 微生物 > 植物 > 无生物[7]。以生命度等级序列为标准, 我们可以去判断词汇的生命度高低。

## 2.2. 生命度与语序互动的理论框架

上文我们提到生命度是一个基于名词短语固有属性的等级序列, 即在语言中, 生命度越高, 越倾向于成为动作的施事者; 生命度越低, 越倾向于成为动作的受事者。例:

(1) a 猫追老鼠。

b 老鼠追猫。

(2) a 我打他。

b 他打我。

(3) a mən sizni kərdym. (我看见你了。)

b sizni mən kərdym. (我看见你了。)

(4) a mən tamaq jedim. (我吃饭了。)

b tamaqni mən jedim. (我吃饭了。)

汉语在表达“施事-动作-受事”关系时, 主要依赖于语序优先原则, 它严格按照词语的线性顺序来区分施事和受事, 如例(1)、(2)中, 施事和受事位置颠倒, 句意完全相反, 仅靠语序区分。在维吾尔语中, 则主要依赖名词的生命度等级来推断施受关系, 语序相对灵活, 且有丰富的格标记, 如例(3)施事和受事虽然位置颠倒, 但受事“siz 你”有明确的“-ni”宾格标记, 所以两句都意为“我看见你了”。例(4) a 中, “mən 我”的生命度高于“tamaq 饭”的生命度, 受事的宾格可省略, 所以语序变化却不改变句意。

但语言有时会允许甚至鼓励违背基础语序, 这是因为生命度已经从语法语义层面延伸至语用交际层面了。在交际过程中, 人们常常聚焦于交谈过程中的话题, 生命度在此时与其深度互动。

## 3. 汉语中生命度对语序的制约

### 3.1. 常规 SVO 语序中的生命度默认匹配

汉语作为典型 SVO 语言, 其无标记句式内部, 成分线性次序与生命度等级形成和谐的默认匹配关系。该模式并非句法硬性规定, 而是源于人类的典型认知原型: 由具备自主能动性的高生命度施事作用于低生命度或无生命的受事。汉语最自然的无标记句式体现为: 有生体词(主语 S) + 动词(谓语 V) + 低生命度/无生体词(宾语 O)。例:

(5) 老师批改作业。

(6) 小狗叼着骨头。

(7) 他打开了窗户。

上述例句里, “老师、小狗、他”具备[+有生性][+自主性][+使动性]特征; “作业、骨头、窗户”具备[-有生性][-自主性][+受动性]特征。论元语序与生命度层级完全契合, 这种高生命度居前、低生命度居后的序列无需额外语法标记, 语感自然, 属于无标记的默认句式。

一旦逆转生命度与句法位置的匹配关系, 句子便会带上标记、语感拗口, 甚至不合语法、生成悖谬语义。例:

(8) a 科学家发明了珍妮纺织机。

b\*珍妮纺织机发明了科学家。

例(8) a 属于默认匹配模式, 句子成立; b 句中发生了生命度顺序颠倒, 无生名词与有生动词匹配, 导致语义荒谬。

(9) 狮子追着羚羊。

(10) a 鸡吃虫子。

b\*鸡吃了。

例(9)、(10) a 中“狮子、羚羊、鸡、虫子”均为有生名词, 但动词“追”“吃”的语义限制了施受关系, “狮子追羚羊”“鸡吃虫子”具备较强认知原型。例(10) b 则存在高度歧义, 无法判定是“鸡进食”还是“鸡遭受处置”, 此时需要引入“把”“被”等标记句式, 改写为“(某物)把鸡吃了”或“(东西)被鸡吃了”以明确语义。

(11) 我们帮助灾区。

(12) 我们帮助他们。

例(11)~(12)的施受皆为高生命度, (11)中“灾区”虽在客观上是地点, 但在人的认知中, 被看作是“灾区的人民”或“灾区的组织结构”, 是一个集体的、有生命的名词, 属于准有生名词, 符合上述默认模式, 句子成立。

(12)中, “我们”和“他们”都是明确的最高生命度代词, 但由于动词“帮助”的语义强大且方向明确, 规定了施益方和收益方, 施受关系清晰, 若要颠倒则是另一个语义了。所以此处是动词语义压制了生命度竞争, 句子成立。

(13) a\*我们介绍一位专家。

b 我们把一位专家介绍给团队。(“把”字句)

c 我们向团队介绍一位专家。(介词结构)

但例(13) a 中, 动词“介绍”语义方向性弱于“帮助”, 句子产生歧义, 既可理解为“介绍专家本人”, 也可理解为“向专家介绍某事”。同时高生命度实体“专家”置于并立位置语感突兀。因此汉语需要采用(13) b、c 这类复杂句式, 以此消除歧义、明确语义指向。

当无生名词出现在施事位置上时, 前提条件是其语义能够被识解为是无生实体自动做出的行为, 如自然力量中的风、雨、雷电, 人造施事的工具、机械, 抽象的事件或力量等。这样的力量没有被隐含的有生名词操控, 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们具有施事的特征[8], 如:

(14) 浓雾挡住了行人的视线。

(15) 经济危机重创了中小企业。

汉语常规 SVO 语序存在稳定的生命度优选匹配模式。当实际表达偏离该默认格局, 例如施事生命度低于受事, 或是论元二者生命度相近时, 仅依靠基础语序不足以区分语义, 必须启用有标记句式或介词, 协调生命度与语序的对应关系, 保障语义清晰。

### 3.2. 双宾句中的生命度效应

双宾语句是考察生命度与汉语语序互动的典型构式, 生命度对语序具备较强约束作用: 与事多为高生命度的指人成分, 受事多为低生命度的指物成分。刘礼进(2003)曾作过调查, 汉语中指人间宾 + 非指人直宾占 88.2%, 非指人间宾 + 非指人直宾占 1%~3%, 指人间宾 + 指人直宾占 10.5%, 非指人间宾 + 非指人直宾没有[9]。其核心规则为高生命度与事须置于低生命度受事之前且贴近动词, 若违反该规则, 就要借助“把”“给”等标记词调整原有语序。如:

(16) 他捐赠博物馆一批文物。

(17) a\*工人送工地材料。

b 工人把材料送到工地。

(18) a\*我介绍你他。

b 我把他介绍给你。

在例(16)中,“博物馆”在认知中被视为“机构实体”,含有生义,在此处它的生命度高于“文物”,此句成立;例(17)中“工地”和“材料”生命度相当,所以a句产生“工人送的是工地材料”还是“工人将材料送到工地”的歧义;例(18)a中同理,“你”和“他”都属于高生命度人称代词,此句有歧义,为明确语义,则在此处添加标记。

### 3.3. “把”字句与“被”字句中的生命度影响

人类语言存在生命度句法关联规律:生命度层级与施事、主语呈正向匹配,低生命度成分则倾向对应受事与宾语。“把”字句作为典型处置句式,要求主语具备强支配性,承担施事或核心致因功能,因而多应用于受事生命度低于施事的句法环境。如:

(19) 我把垃圾扔了。

(20) 李四把张三打了。

“被”字句主要用来表示一个受事者受到某种动作行为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其中最常见的是用于对受事者或说话者来说是受损或是不愉快、不愿意的情况[9],其本质为受影响态,通常施事的生命度小于受事时,用“被”字句。如:

(21) 我被狗咬了。

(22) 王二被车撞了。

但当受事是无生命物时,“被”字句的使用有明显限制,动作必须导致受事发生改变,施事不可省略,除非施事是有生命且有意的,如:

(23) 杯子被(我)打碎了。

(24) 书被(老师)放在了桌子上。

(25) \*蒲公英被吹散了。

“被”字句省略施事时,默认施事是人,如例(21)和(22)施事隐含为人。如果施事是无生命物,则必须出现,否则会产生歧义,如例(23),“蒲公英”是被“风”吹散还是被“人”吹散。

当施事和受事都是无生命名词时,受影响力是主要的,生命度在这里则是次要的,此时“把”字句或“被”字句通用,如:

(26) a 洪水把桥冲垮了。

b 桥被洪水冲垮了。

(27) a 垃圾被风吹跑了。

b 风把垃圾吹跑了。

例(24)~(25)中,“洪水”“风”虽然无生命度,但它是自然力,具备物理致因,被赋予了高施事力,“桥”“垃圾”被赋予了高受事性,句子成立。

### 3.4. 地点存现句中的生命度制约

在汉语的地点存现句中,地点主语属于无生名词,存现物宾语具有[±有生]特征,生命度不直接作用于主语和宾语上,而是和谓语动词是否有自主意志、是否有动态性及宾语的定指性有关。如:

(28) 桌上放着几本书。

(29) a 树下站着两位老人。

b\*树下乘凉着两位老人。

c\*树下站着张三。

(30) 床上躺着病人。

例(26)无生名词“书”作存现宾语,表静止状态,句法自然。例(27)a高生命度的“老人”作存现宾语,谓语需消解自主意志,“站”仅描摹姿态,符合句式;(27)b“乘凉”含自主意志,句式不成立,需调整为“树下有两位老人在乘凉”。(27)c强定指的“张三”作存现宾语,语感弱于“张三站在树下”。例(28)“病人”虽属高生命度,但“躺”仅表静止,不体现意志,生命度效应被弱化。由上述分析可得出在地点存现句中,谓语动词需排斥[+自主意志]特征,宾语生命度与动词动态性成反向制约关系,且宾语不具有强定指性。

## 4. 维吾尔语中生命度对语序的制约

### 4.1. 常规 SOV 语序与格标记的主导作用

汉语依靠语序分辨施受,维吾尔语则依靠完备的格标记界定名词论元的语义角色。维语核心论元均位于动词前,格标记完整时语序不受限制;一旦格标记缺失,生命度等级便成为判别施事、受事的依据。格标记与生命度形成互补协同,让维吾尔语在固定 SOV 框架下实现语序灵活调整。如:

(31) *mən bir roman jazmaqçi.* (我打算写一本小说。)

虽然此处“roman 小说”省略了宾格,但其生命度明显低于“mən 我”的生命度,所以句意明确。

### 4.2. 生命度在宾格标记脱落现象中的作用

用来表示行为动作与客体的关系的格称为宾格,维吾尔语中名词的宾格形式是名词词干后附加-ni 构形词尾构成,只能与及物动词连用。宾格的脱落并不是随意的,它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宾语的生命度和宾语是否确定。

当主语和宾语的生命度相当或主语的生命度低于宾语时,宾格标记必须强制出现,否则句子就会不和语法或产生歧义,如:

(32) a *u adilni urdi.* (他打了阿迪力。)

b *adil uni urdi.* (阿迪力打了他。)

(33) a *maqına uni soquwetti.* (车撞了他。)

b *u maqınini soquwetti.* (他把车撞了。)

例(30)中代词“u 他”与名词“adil 阿迪力”生命度持平,动词词形又无区分标记,只能依托宾格判别施受角色,宾格不可省略,否则句子不合语法。而例(31)内部论元生命度差距明显,“maqına 车”生命度远低于“u 他”,宾格标记起到强化施受关系的作用,一旦宾格脱落,便会引发语义歧义。当主语的生命度高于宾语且宾语紧靠谓语时,宾格后缀经常脱落,如:

(34) *mən kitab oqujmen.* (我读书。)

(35) *u tapfuruq ijlajdu.* (他写作业。)

宾格脱落并非仅由生命度决定,而是生命度、定指性、受事性以及宾语的话题、对比焦点属性共同形成层级约束。高生命度成分大多具有定指特征,自主主动性强、受事程度低,充当宾语时必须附带宾格标记;低生命度成分多为不定指,易受动作支配、受事性突出,常规情况下可省略宾格,只有特指该事物时才需要标注宾格。

除此之外,当论元作为已知言说话题,或是承担对比焦点以区分不同对象时,也需要添加宾格标记,明确其特指身份。如:

(36) bu gezitni men oqudum. (这本杂志我读过。)

(37) men u nefsytini je-dim, bu alma emes. (我吃了那个梨, 不是这个苹果。)

例(34)“gezi 杂志”加上宾格并且前置, 表示此时是一个已知对象; 例(35)的“nepsyt 梨”加上宾格表示强调。

在维吾尔语中常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宾语和动词一起表达一个整体行为动作, 即动宾复合动词, 此时名词的个体性、指称性消失, 宾格省略, 只保留动作的类型意义, 如:

(38) a biz beliq tutqili barimiz. (我们去钓鱼。)

b\*biz beliqni tutqili barimiz. (我们去钓鱼)

例(36)中“beliq tutmaq 钓鱼”在此处是一个整体性的动作, 宾格省略。

### 4.3. 维吾尔语宾语对时量成分的生命度制约

生命度对句法成分排列位置的制约作用, 在汉语中已有深入探讨。武氏河(2006)在其《现代汉语语序研究》一文指出, 汉语中当动词后同时出现时量补语与宾语时, 宾语的生命度决定其排列语序, 即低生命度宾语既可位于补语之前, 也可位于其后, 而高生命度宾语则强制要求出现在补语之前<sup>[10]</sup>。在维吾尔语中, 笔者也观察到类似的制约效应, 如:

(39) a men sizni yf saet saqlidim. (我等了您三个小时。)

b \*men yf saet sizni saqli-dim. (我三个小时等您。)

(40) a men ikki kyn dehqanqiliq qildim. (我干了两天农活。)

b men dehqanqilini ikki kyn qildim. (我农活干了两天。)

当宾语由生命度高的论元充当时, 要求宾语出现在时量成分之前, 如例(37) a 句子成立, 而 b 将宾语“sizni 您”放到了补语“yf saet 三小时”之后, 句子不成立; 当宾语由生命度低的论元充当时, 宾语可出现在时量成分前或时量成分后, 如例(37) a, 若出现在时量成分之前需要加上宾格标志显示其定指倾向, 如例(38) b “dehqanqiliq 农活”加上宾格, 句子成立。若不加宾格标记, 句子则不成立。

### 4.4. 双宾语结构中 与事 宾语的生命度制约

在维吾尔语的双宾语结构中, 通常有三个论元, 即施事、与事、受事。施事作主语, 与事作接收者, 通常带向格-ka/-qa/-ge/-ke, 受事作被转移的物体, 通常带宾格-ni, 若有时因不定指, 宾格可以脱落。

(41) a men apamka bir tal gyl sowka qildim. (我送妈妈一朵花。)

b men bir tal gylni apamka sowka qildim. (我把一朵花送给妈妈。)

(42) a men aslanka bir tal beliq ber-dim. (我给小猫一条鱼。)

b men bir tal beliqni aslanka berdim. (我把一条鱼给小猫。)

(43) a jirket bankika nurkun amanet qojdi. (公司往银行存了一大笔钱。)

b jirket nurkun pulni bankika amanet qojdi. (公司往银行存了一大笔钱。)

在维吾尔语典型双宾语句式中, 与事宾语的生命度通常高于受事宾语, 如例(39)~(41)所示, 人称名词“apam 妈妈”的生命度高于无生名词“gyl 花”; 同属有生范畴的“aslan 小猫”和“beliq 鱼”, 在人类认知情感倾向中, 宠物“aslan 小猫”的生命度层级优先于普通动物“beliq 鱼”; 机构名词“banka 银行”属于准有生名词, 指由人构成的社会组织, 其生命度同样高于无生名词“pul 钱”。

受生命度层级制约, 维吾尔语双宾语存在无标记优选语序: 高生命度与事宾语居前, 低生命度受事宾语置后。例(39)~(41)的 a 句语序契合生命度等级, 属于母语者惯用的基础无标记句式。

若打破该默认语序, 将低生命度受事宾语移至与事宾语之前, 则违背高生命度论元优先占据优势句

法位置的类型倾向, 句子不能直接成立。受事若要实现前置, 必须强制附加宾格标记-ni 对客体加以定指, 以此获得句法合法性, 见例(39)~(41) b 句。

语序变换后的带宾格句式虽符合语法规范, 但自然度低于无标记基础句式, 属于有标记变式。两种句式语义基本一致, 核心差异体现在语义焦点上: a 型基础句式重点凸显接收方的与事成分“apam 妈妈”“aslan 小猫”“banka 银行”; b 型变式通过宾格标记强调被转移的受事客体“gyl 花”“beliq 鱼”“pul 钱”。

维吾尔语无标记双宾语结构遵循稳定的层级规律: 与事生命度  $\geq$  受事生命度。当句法语序出现“受事前置、与事后置”的逆层级排布时, 受事成分必须借助宾格标记完成句法合法化, 这也是生命度制约维吾尔语双宾语语序的重要体现。

#### 4.5. 被动语态中生命度的体现

维吾尔语被动形态依托及物动词词形变化生成, 语法主语为动作承受者, 适用范围显著广于汉语。及物句式存在高生命度主语、低生命度宾语的优选匹配, 若打破该倾向则产生有标记句法, 被动态为代表结构。无生命名词作主语时, 因不具备施动能力, 动词通常需取被动形式。如:

(44) a weziƣe muddettin burun tamamlandi. (任务提前完成了。)

b men wezipini muddettin burun tamamlidim. (我提前完成了任务。)

例(42) a 中, “weziƣe 任务”是无生命名词, 是动作的承受者, 所以此处使用的是被动态; (42) b 中出现了高生命度的“men 我”, 所以此时“men 我”作主语, 成为“weziƣe 任务”的施动者, 此处使用主动态。

(45) a u tekliƣ qilindi. (他被邀请了。)

b \*u men teripidin tekliƣ qilindi. (他被我邀请了。)

c men uni tekliƣ qildim. (我邀请了他。)

当高生命度名词成为动作的承受者时, 且没有出现动作主体(即施事), 在句中可以做受事主语, 如例(43) a。在(43) b 中, 出现了施事“men 我”结合 teripidin 作状语, 受事仍作主语, 句子成立, 但站在母语者的角度, 此类表达就不如(43) c 的主动态自然。所以高生命度在被动语态中作主语时, 没有低生命度作主语自然, 此时我们常使用主动态。

维吾尔语中的被动语态中还会经常出现后置词“teripidin”表示被动态动词的逻辑主体, 此时主体应该是人或者是表示人的组织或单位[11]。此类使用常出现在正式文体如政论文、宣言社论等文体中, 书面色彩较强烈如:

(46) lekin u ƣeƣridin otyƣ dƣerjanida tekƣyrgyƣiler teripidin tosuwelinƣan.

(他在通过边境的过程中, 被检查人员拦下来。)

(47) bu kitab uƣurƣıƣa terdƣime qilinip, ƣindƣaƣ ƣelq neƣrijati teripidin neƣr qilinƣan. (这本书被翻译成维吾尔语, 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上两个例句都是用 teripidin 后置出主语, 谓语动词用被动态来表达的, 句中施事的“tekƣyrgyƣiler 检查人员”“ƣindƣaƣ ƣelq neƣrijati 新疆人民出版社”都是人或由人组成的集合名词, 且句中既有受事又有施事, 受事作主语, 施事结合 teripidin 作状语, 谓语动词用被动态形式。

此外, 在维吾尔语中, 即便属于同一生命度等级的名词, 其语法表现也存在差异。以无生名词为例, “风”“雨”“雷”“电”等表示自然现象、具有规律可循的客观事实词汇、具有抽象意义的感知词汇等也具有施事性, 在句中常作施事主语, 如:

(48) ƣamal iƣikni eƣiwetti. (风把门吹开了。)

(49) bowajniŋ kōzi u qapqa ŋyŋyptu. (老人的目光落在了那个盒子上。)

## 5. 汉维语对比分析：共性与差异

### 5.1. 共性规律

依据语言类型学共性, 汉维共享统一生命度连续层级: 一二人称 > 第三人称 > 专有称谓 > 普通人 > 动物 > 微生物 > 植物 > 无生物, 高生命度成分优先充当施事主语, 低生命度成分倾向为受事宾语。

两种语言陈述句均遵循高生命度前置、低生命度后置的基础语序, 违背该范式则需显性句法标记补偿: 双宾结构生命度次序失衡时, 汉语使用“把、给、向”, 维语添加宾格后缀-ni; 时量搭配中仅低生命度宾语可自由移位; 低生命度作主语、高生命度作宾语时, 汉语使用把/被字句, 维语动用被动形态与后置词 *teripidin*。

两类语言存在统一联动规律: 高生命度名词多为定指、受事性弱, 低生命度名词多不定指、受事性强。维语高生命度宾语必须带宾格, 无定无生宾语可省略标记; 汉语高生命度宾语前置处置需用把字句, 无生宾语常规后置无需标记。宾语若作话题或对比焦点, 无论生命度高低均需句法标记。

生命度是连续认知等级而非割裂类别, 无生名词内部亦存在层级差异, 自然现象因具备能动属性, 生命度高于人造器物, 印证生命度以人类为中心的认知本质。

综上, 生命度是调控语序的深层认知约束。维语形态完备, 依靠格标记区分论元, 语序灵活, 生命度仅起辅助作用; 汉语缺乏形态, 语序为辨明施受的核心手段, 生命度承担消歧功能。两类语言偏离生命度优选语序时均会增设句法标记, 体现人类判别施动主体的跨语言认知共性。

### 5.2. 差异与类型学动因

汉语与维吾尔语处理生命度对语序的制约存在类型层面的策略差异。汉语作为孤立语缺乏形态手段, 依靠语序、虚词确立语法关系, 生命度可直接调整语序或激活处置、被动等特殊句式; 维吾尔语是黏着语, 格标记体系完善, 语序自由度高, 生命度优先管控形态标记的选用, 再间接作用于语序。

在典型句式二者表现不同: 双宾结构里, 汉语依靠固定语序匹配生命度层级, 语序冲突时借助“把、给、向”标记调和; 维吾尔语协同向格、宾格共同约束论元, 受事宾语前移至与事前必须附加宾格后缀-ni。被动句式上, 汉语被动谓语句义受限, 对主语生命度约束较强; 维吾尔语所有及物动词均可派生被动形式, 适用场景更广, 高生命度受事作被动主语语感不够自然。汉语地点存现句还有专属限制, 高生命度存现宾语需搭配非自主主义动词, 同时排斥强定指指称。

两类语言的句法分歧源于语言类型本质区别: 汉语是生命度与语序直接互动, 维吾尔语则由格标记、语序、生命度三者联动调控。孤立语重语序、黏着语重形态的核心差异, 使得二者针对生命度层级演化出两套各具规律、截然不同的句法处理方式。

## 6. 结论

生命度作为语言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 对汉维语的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语言类型学与对比语言学的视角出发, 系统考察了生命度在汉维语句法语序中的制约影响作用。通过理论梳理与语料分析, 得出以下主要发现:

第一, 生命度是制约汉维语句法语序的重要因素。无论是汉语还是维吾尔语, 高生命度成分都优先占据主语位置, 低生命度成分优先充当宾语。

第二, 两种语言在生命度对语序起到的制约影响采取了不同的语法策略。在汉语中, 生命度直接作

用于语序;在维吾尔语中,生命度首先体现在形态标记上,其次才作用于语序上。

第三,在具体句式上,两种语言的生命度制约表现出系统性的差异,具体详见第二部分,第三部分。

笔者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生命度在汉维语句法语序中的具体体现,从生命度对句子语序的影响角度出发,在汉维语对比框架下系统分析了常规语序、双宾句、被动句、宾补结构等多种结构,揭示了生命度在不同语言类型中的共性与差异。本文还结合了汉维语实例,尤其是对维吾尔语语料的细致分析,为类型学理论提供了具体的语言事实支撑。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生命度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仍具有广阔的空间。一是可构建汉维语平行语料库,统计不同生命度等级论元在主语、宾语位置上的分布频率,以及宾格标记脱落与生命度、定指性的相关性,增强结论的可信度。

二是可结合语用学理论,分析生命度如何影响话题化、焦点化以及语序的语用重组,揭示生命度从语义层面向语用层面延伸的条件和机制。

未来研究可在上述方向继续推进,亦可进一步考察生命度与其他语法范畴的跨语言互动模式,以期对生命度理论的深化与类型学研究的拓展提供更多有益参考。

## 参考文献

- [1] (美)伯纳德·科姆里. 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M]. 沈家煊,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 [2] (美)威廉·克罗夫特. 语言类型学与语言共性[M]. 龚群虎, 等,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 [3] 扎宜提·热依木. 汉译维中增减词语和调整语序问题浅谈[J]. 语言与翻译, 1995(4): 77-84.
- [4] 郑婕. 维吾尔语句法嬗变中的词序作用[J].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94(4): 99-107.
- [5] 张世才. 维吾尔语语序刍议[J]. 语言与翻译, 1999(2): 20-23.
- [6] 高丽萍. 生命度对汉语句法和语义的制约和影响[D]: [硕士学位论文]. 天津: 天津大学, 2005.
- [7] 王珏. 汉语生命范畴初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8] 刘正光, 著, 王文斌, 总主编. 英汉认知语义对比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
- [9] 刘晓. 生命度对语言形态和句法的制约和影响[J]. 科教导刊-电子版(中旬), 2014(8): 67-68.
- [10] 武氏河. 现代汉语语序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 [11] 胡传成, 张琦, 安德源, 李少平, 编著. 维吾尔语词汇语法大纲[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6.